

关于“信任负担”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作用的历史思考

王小迅

本文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探讨了“信任负担”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作者认为,“信任负担”是执政党的一种警觉和忧患意识,它对中国共产党履行其职责的活动有着积极影响,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也表明,如果对“信任负担”缺乏正确和全面的认识,对党的活动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其后果和损失也是严重的。改革以来,党的活动同样受到了“信任负担”的积极和消极的两面作用,同时又出现了缺乏“信任负担”的问题。

作者:王小迅,男,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必须取得来自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维护和加强党同群众的信任关系。但信任和支持既是一种资源和动力,也是一种负担和压力,造成“信任负担”。历史证明,“信任负担”是客观事实,早已存在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所谓“信任负担”,是执政党的一种警觉和忧患意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信任负担”与其历史使命感和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宗旨有着密切联系,是对党同群众信任关系实际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产生的一种担心和思虑。对党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表现的思虑,对群众信任、支持党的现实状况的关注,是“信任负担”的具体表现。在群众意见很多的情况下,会产生“信任负担”;在获得群众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出现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信任负担”。

“信任负担”的产生首先来自执政党的地位和自身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决定的。面对中国现实的经济状况,群众有尽快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和要求,为此,希望把建设事业搞好。群众的情绪在全党上下会造成一种压力,形成“信任负担”。但既要建设,又要生活,这里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搞不好,党同群众的关系容易紧张起来,造成“信任负担”。

“信任负担”的影响作用毕竟是通过党的活动实现的,尤其是通过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实现的。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表明,“信任负担”的存在对党履行其职责的活动产生着积极影响,但如果对它缺乏正确和全面的认识,给党的活动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其后果和损失也是严重的。对这个问题,本文仅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作一探讨。

一、“信任负担”是加速农业合作化现实的一个因素

我国农业合作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进行的。广大农民通过土地改革，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面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党同农民群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①而如何解决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又和当时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联系起来。现实情况是国家工业化建设同小农经济带来的农副产品供应波动的矛盾逐渐尖锐化起来。因此，党的领导人认为，实行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解决问题的现实的、有效的途径。

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热情和积极的，为此曾尖锐批评了党内合作化问题上主张稳妥前进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敦促全党态度更积极一些、行动更快一些。毛泽东同志对合作化不仅可以实现农业对工业的有力支援，而且将很快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的前景估计是非常乐观的，认为“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②为了尽快实现合作化目标，党充分运用了它的政治影响力，向农民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号召和动员农民入社。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强迫命令的毛病，但应该承认，党同农民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确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农民对党领导他们土改翻身记忆犹新，感激之情犹在，农民根据自身经验，相信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相信党向农民作出的鼓舞人心的承诺是真诚的，因此农民对合作化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抱有很大期望。其次，土改中的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现在又带头听党的号召加入合作社，成为合作化运动的骨干力量。如果说情况不是这样，合作化的成功完全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农民完全是不自愿的，就难以解释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全国范围的合作化运动没有出现社会动乱，几亿农民群众的情绪基本上是稳定的、健康的；二是合作化后农民仍保持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在几年内继续增产和稳产。因此可以认为，合作化的成功是在经济因素的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广大农民基于对党的信任和对美好前景的憧憬而作出选择的结果。后来证明，当时对农民要求合作化的积极性估计过高了，对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工作看得容易了，对在合作化条件下实行统一经营的生产潜力也估计高了。由于缺乏经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些简单了。

不过，由于计划经济对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主要由农业提供的积累（合作化保证了这一点），生产关系变革唤发起的群众从事建设的热情和干劲，得到开发和利用的巨大人力资源，可以弥补资金不足的难以数计的劳动投入，使我国迅速走完了工业化的“初始积累”阶段。

所以，在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与成就相比完全是次要的。至于合作化的完成是否过急过快，单一的统一经营形式是否适合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等问题，当时党还不可能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1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197页。

成熟思考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条件。新事物只有在前进中才能完善。当时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只有不负众望，带领群众继续前进，这才是党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二、“信任负担”过重与大跃进的发生

农业合作化及其以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影响深远。一方面，它促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使农村的发展相对迟缓；一方面，比较有保障的生活条件缓解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职工对平均主义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的差距又使农民的消极情绪难以避免；一方面，党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制约了对农民利益的关注，另一方面，正是并非有意造成的“忽视”更加重了不希望失信于农民的“信任负担”，从而对党的决策与行动产生着影响，成为导致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国家需要优先进行工业化建设，主要积累来自农村，具体反映在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结果不能不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导致后来农民思想情绪的反复。但问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如果合作化了还是穷，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对党的信任，其生产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挫伤。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和思虑，在1956年合作化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刻，如何处理工业化建设同农民实际利益的关系，便成为毛泽东同志考虑的重大政策性问题。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不要把农民挖苦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争取农民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①

尽管党有着改善农民生活的良好愿望，但工业化与农民实际利益的关系是一个很难协调好的问题，加上实际上存在着压农业保工业的倾向，所以合作化后一些农民感到所得利益不多，和工人比较，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很好改善。这种情况是当初搞合作化时被掩盖了而现在必须正视的现实。

问题是，只有把经济建设尽快搞上去，国家才有更多的余力满足或部分满足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建设速度上不去，工业也不能自立，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积累的状况势必长期化，农民的利益就难以得到有力保证。尤其是在当时，农民是在合作社里从事生产劳动的，对现状的耐心和韧性是个问题。不能期望农民会长久从事看不到多少实际利益的事业。

其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速度已经不低。因此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应根据实际可能，既积极又稳妥地前进，另一种意见则主张鼓足干劲，把建设速度搞得更快一些。毛泽东同志是赞成后一种意见的。应该说，经济上的高速度“这不只是哪一个人的愿望和情绪，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当时全党和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情绪。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只要党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于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快一些的。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反对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努力奋斗。”^②

基于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期望，大跃进是继合作化之后，党充分发挥它的政治影响力建设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274页。

^②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

会主义的重大努力。然而，大跃进提出的高指标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导致了瞎指挥和浮夸风的泛滥。党的许多干部变得头脑发热和不谨慎了，造成工作上的急促和粗糙、混乱和偏差。结果，大跃进既没有完成经济上的高指标，也没有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反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关系的破坏。困难和挫折接踵而来，群众对经济发展前景的热情期待落了空。

三、“政治性补偿”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鉴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同志对通过经济跃进满足群众利益要求的可能性已不再抱过高的期望，认为在中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①所以还是要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问题是，一方面在已确立的经济体制框架内，群众利益难以得到很多满足，另一方面又要求群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加强党同群众的信任关系，使他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实际上与另一个问题相联系，即要保持群众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是否一定要有很多的物质利益？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认为解决困难的出路是有的。他的意愿是要加强“政治性补偿”作用，而加强其作用则是后来促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谓“政治性补偿”，就是通过党在政治上的主动行动和发扬民主的方式，消除或缓解因物质利益不足、因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给党同群众信任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政治性补偿”作用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满足的作用。如果党主动采取行动克服自身存在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如果党发扬民主，让群众讲话，允许群众提出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发泄一下不满情绪，这尽管不能立即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但由于沟通了感情，可以理顺群众的情绪，增强群众对党的信赖感；尽管党在工作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由于加强了联系，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增强群众对未来的信心，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党同群众的信任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实行了“政治性补偿”比给群众一些实际利益，更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当社会主义建设比较顺利、群众可以得到较多利益的时候，“信任负担”较轻，可能缺乏实行“政治性补偿”的紧迫感。但当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困难和挫折、群众所得利益不多甚至受到损害的时候，“信任负担”较重，实行“政治性补偿”的必要性就显得突出了。大跃进后，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暂时困难，群众有意见、有情绪需要表达。毛泽东同志提出：“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②由于党对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给群众以鼓舞，使他们心情比较舒畅，使党能够带领群众团结奋斗、战胜困难。

当然，毛泽东同志并不是因为遇到暂时困难，才想到发扬民主，实行“政治性补偿”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经常思虑和感到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脱离群众，会不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28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819、822、838页。

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诸如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与其消极地防范这个问题，不如积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即通过发扬民主和实行“政治性补偿”的方式，既有助于帮助党改正缺点、错误，密切党群关系，又发动了群众，将群众在情感上的满足引导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这就有可能摆脱单纯关注于群众物质利益的满足、而实际却难于实现的困难处境，找到一种在物质利益不足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旺盛精神的实践道路。

大跃进失败，使承受沉重信任负担压力的毛泽东同志越来越重视“政治性补偿”的作用。到了晚年，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党已经脱离了群众，认为党内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同群众是對抗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要理顺群众情绪、振奋群众精神，唯有实行大民主，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任何意义上可以使用的政治信任资源是无法想象的。然而这种可使用的资源不仅存在而且十分巨大。工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群众，“走资派”的提法使他们产生了对自身地位的忧虑，何况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加上极少数投机分子、野心家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使群众比较容易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予政治上的信任并盲目顺从，使社会生活迅速从建设常轨滑向动乱的旋涡。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是消除党在长期管理国家生活中滋生出来的消极腐败现象，密切党群关系，调动起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保证党永远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补偿”的色彩。当然，“政治性补偿”的目的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使群众振作起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自觉抵制“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建设以较少的费用成本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①但是，毛泽东低估了群众对“大锅饭”等平均主义的消极情绪，低估了群众对改善生活的愿望，结果党被搞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秩序被搞乱了，而“政治性补偿”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四、改革后“信任负担”的实际表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加强党同群众信任关系的历史契机。从改革的意义上看，有压力、有负担是件好事。改革之前，到处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为什么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突破？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旧的管理体制下，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农民的不满和意见最大，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最强烈，给党带来很大的“信任负担”的压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左”的指导思想不纠正、太多的条条框框不摒弃，不仅违背农民的意愿，也将失去农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出路。

时至今日，经济建设要搞好、群众生活要改善，也是党承受的最严重的“信任负担”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考虑，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搞经济建设“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深刻总结了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经验教训，人们有理由相

^①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② 《邓小平文选》第213页。

信，由于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问题，急于求成的问题今后将会得到有效治理。但是，几年下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指导思想问题的解决并不等于在实际上可以消除“信任负担”的消极性影响。由于群众急于求富，在社会的普遍压力下，一些同志的头脑又开始变得不冷静了，情绪又开始急躁起来，不自觉地产生了急于求成的现实动机，并且又在为急于求成的决策和行动寻找“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犯了过去的错误。

由于“信任负担”的压力，不仅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在改革问题上也表现出急于求成。须知，我党是背着历史的包袱领导人民进行改革的，虽然党发动和领导了改革，但它不是轻装前进。总有人在一旁议论党领导中国建设的资格和能力，对改革百般挑剔。考虑到过去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处理，有些想办好的事情没有办好，加上对改革没有经验，很多同志都希望把改革搞得又快又好，使群众感到满意，不希望改革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而改革初期农村的超常性、补偿性的经济增长的事实则助长了这些同志对改革的盲目乐观情绪，开始变得不谨慎了，认为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是“一改就灵”、“一放就活”，使整个社会对改革的看法也染上了浪漫色彩。后来的实践证明，推进改革缺乏配套措施，一些问题没有进行周密考虑和细致处理，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和障碍。

当改革出现复杂和困难局面时，群众才开始真正认识改革的实际。起初对改革抱过高期望的群众，现在正在被社会生活的许多问题所困扰，缺乏精神准备，难以接受缺乏诗意的现实，变得不耐烦了。又由于涉及到利益得失，群众对改革的承受力和韧性表现不足，对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容易议论纷纷，甚至产生报怨情绪。党同群众信任关系的不稳定和波动也随之发生。这使党在改革过程中感受到了很大的“信任负担”的压力。有些同志因而滋长了急躁情绪和盲动性，幻想在改革问题上会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动辄认为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为此要加速改革，不自觉地背离了改革需要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结果不顾群众承受力不足的事实，不顾社会上存在的消极抵触情绪，硬着头皮使改革过早地进入了价格、体制的“攻关”阶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给改革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和障碍。而改革过急与经济建设过急相结合的社会综合症，又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1989年的社会政治风波，教训是深刻的。

改革以来，在“信任负担”问题上又出现了需要引起重视的新的倾向。改革后尽管党群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但党内一些人对此已经失去了任何压力和负担，为党为国分忧之心已踪影全无。这些人数量虽少，但足以说明，在当前的情况下，“信任负担”的有无是衡量党员党性有无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批党员、干部不是失去了“信任负担”，而是缺乏“信任负担”。有些同志鉴于建国以来搞群众运动带来的折腾，决策“科学化”、行动“合理化”的呼声甚高，但在关注科学化与合理化的同时却淡化了群众观点，在重视管理与信息的同时却忽视了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些同志对种种有损党群关系的事情不关心、不抵制，甚至为一己私利放弃原则、随波逐流。对维护党群“信任关系”缺乏危机感、紧迫感，或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不打算在行动上实行。他们这样做，结果只能跟着形势亦步亦趋，在事态的演变中处于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状态。显然，如果这种缺乏“信任负担”的倾向一旦泛滥，党将被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产生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五、历史的启示

综观历史，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否正确和全面地对待“信任负担”问题，至关重要，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果，甚至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确对待“信任负担”，对党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和偏差，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制定符合实际和群众愿望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坚持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宗旨，及时倾听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的愿望，进而改正错误。

正确对待“信任负担”，可以使党在决策和行动上注意保持谨慎的态度，避免轻率行事。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都是同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但在眼前利益的问题上难免有时一致、有时不完全一致，甚至需要群众作出暂时的、必要的牺牲。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党会存在“信任负担”的压力，因为处理不好，有可能出麻烦和乱子。有这样的考虑，“信任负担”的存在就是保证谨慎决策、慎重行事的一个积极因素。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不要把资源都用于建设，使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现在的改革问题上，也是既要改革、也要群众。当然，要推进改革，对群众的落后意见不能迁就，但对群众的呼声和情绪不能不考虑，对群众的承受力更要求实估计。否则，脱离群众，导致改革受阻。

应该看到，“信任负担”对执政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执政后的权力和物质生活环境，容易淡化“信任负担”，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可以认为，一个没有“信任负担”的执政党，不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党，就是政治上衰败的党。我党所以能够经受住几十年执政的考验而仍然保持生机和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始终保持了“信任负担”的压力。

实践证明，如果党在政治上不经常保持足够的忧患意识和警觉性，精神状态就会松懈麻痹。尤其在注意力转向建设和改革的时刻，容易放松党的自身建设，党群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蓄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通和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在社会稳定的表象后面，存在着发生突变、震荡的形势变化的可能性。可见，保持经常性的信任压力和负担，对于加强执政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我完善意识，对于改善党同群众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量的事实和经验说明，只要正确对待和善于利用“信任负担”，它就是一个积极因素。但也应该看到，“信任负担”既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就有可能使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产生急于求成的心理，急于作出成绩，急于使群众见到实际利益，从而使决策和行动带有盲目性。结果在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经济建设的速度上搞得过急过快，向群众作出的承诺过多，实际却难于实现。由于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没有得到相应报偿，便使群众产生了失望或埋怨情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信任负担”的消极性影响就显现出来了。

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表明，“信任负担”的存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其作用是深层次的和强有力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防止“信任负担”的消极性影响，关键是要提高对其认识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既要拥有群众，又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出发，使两方面比较好地统一起来。

1991年11月20日

责任编辑：陈庆利